

《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 文化教育交流

肖 朗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1872 年, 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 13 封信函等汇编成《*Education in Japan*》一书, 次年在华盛顿出版; 1896 年, 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又将这 13 封信函等译成中文, 取名为《文学兴国策》, 由上海广学会刊印。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文学兴国策》; 森有礼; 林乐知; 文化教育交流

[中图分类号] G513.3;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1-0014-09

一、导言: 一段并未尘封的交流

1848 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趋势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 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 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1〕(p. 470) 19 世纪 40 年代后,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即雄辩地证实了上述论断。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 野蛮的、闭关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开始建立起联系”〔2〕(p. 110)。1853 年后, 美、英舰队相继闯入日本港口, 为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近代化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契机。欧美列强的武力入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 促使两国在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本文所探讨的《*Education in Japan*》及其汉译《文学兴国策》, 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也是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成果。1872 年, 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有关日本教育改革的 13 封信函等汇编成《*Education in Japan*》一书, 次年在华盛顿出版; 1896 年, 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又将《*Education in Japan*》的主要内容译成中文, 取名为《文学兴国策》, 由上海广学会刊印^①。本文即以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史实

[收稿日期] 2001-06-18

[作者简介] 肖朗(1958-), 男, 江苏苏州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教育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研究。

① 森有礼所辑英文原著《*Education in Japan*》及其林乐知的汉译本《文学兴国策》在国内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 但有关的先期性研究对两书未能展开充分研讨, 甚至连其英文原版书名尚不知其详。例如, 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根据龚心铭为《文学兴国策》所写“序言”, 指出 1896 年林乐知“复将日人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 译为《文学兴国策》二卷”(《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69 页)。后学界多沿用此说。查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第 3 卷《文学兴国策》的英文原版书名为《*Education in Japan*》, 内中辑录美国各界人士 13 封信函及两个附件, 并附有森有礼用英文撰写的“序言”。可见, 森有礼所辑英文原版书名准确的译法应为《日本的教育》。

为个案,着重探讨《*Education in Japan*》及其汉译《文学兴国策》成书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与影响等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有助于推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二、森有礼与《*Education in Japan*》的编辑

如果把发生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的这段交流比作一幕历史剧,那么,森有礼和林乐知便是这幕剧的两位主角。森有礼于1847年出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入藩校造士馆,接受汉学启蒙教育;后就读于藩校开成所,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865年,他奉藩主之命,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研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1867年赴美,加入了美国宗教界人士哈里斯(T. L. Harris)组织的名为“新生社”的宗教社团。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礼返回祖国,在新政府中担任公议所所长等职。1870年至1884年,他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先出使美国,任少辩务使;1875年,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中国,与李鸿章谈判两国外交问题;1878年回日本,任外务大辅;不久,又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英国。1885年日本建立内阁时,他就任文部大臣。

森有礼生当日本社会由“锁国”变为“开港”的历史转折时期。他幼时虽接受了封建传统教育,但成年后长期生活在欧美国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多年从事外交活动,但始终关心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出使美国期间,他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了斯宾塞等人的学说,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森有礼先编辑出版了《美国的生活与资源》(*Life and Resources in America*)一书,后又向日本政府递呈了《日本的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 in Japan*)一文,以此来表达他对日本近代化改革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森有礼认为,信仰的自由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为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的基本要素,因为这种自由是开启民智的必要前提。当时,日本政府仍视基督教为邪教而加以排斥,民间对基督教抱有恐惧心理的人也很多。森有礼对这种偏见进行了勇敢而坦率的反驳后,批评了认为现今若允许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便会造成社会矛盾及纷争的观点。他断言:“不革命就不可能有进步。”〔3〕_{p. 294}认为进步要经过几度变革后才能实现,因而,种种矛盾和纷争的存在对日本社会来讲是应该受到祝福的事。他指出,万一由此而产生暴力,政府必须承担责任,保护人民免受暴力之害。为此,他强调:“应制定规范的法律,以确保全体人民享有各种权利,使之免受暴力之害;进而,应建立完备的教育制度,以增强全体人民的道德力量,使之足以捍卫自己的权利。”〔3〕_{p. 292}。森有礼已清醒地认识到,法律和教育是近代国家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他曾援引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的两句名言:“苹果若尚未成熟,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苹果;同样,人若未受教育,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教育是惟一的、政治安全阀。在教育这一诺亚的方舟之外,惟有滔滔的洪水。”〔3〕_{p. 290}他考察了美国的教育对维护其共和政体的作用后,得出结论道:“要想使共和政体长治久安,教育是必要的先决条件。”〔4〕_{p. 6}。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创立国民教育制度是日本的当务之急,这种制度不受特定宗教意识及党派政见的影响,所有的人无论其出身、性别、职业如何都应平等受教。

为了探寻教育兴国之路,森有礼在美国广泛开展了被称之为“文化外交”〔5〕_{p. 125}的活动。他曾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与之探讨创立日本近代教育的种种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访问马萨诸塞州,实地调查了解当年贺拉斯·曼在此领导实施义务教育的事迹。1872年2月3日,森有礼从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向美国政府各部及议会发照会一份,并向美国著名大学校长及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发公函一份,请求他们围绕教育对一国物质繁荣的影响,教育对商业的影响,教育对农业、工业的影响,教育对国民社会的、道德的、身体的状态的影响,教育对法律和政体的影响等五个中心问题,陈述其对教育兴国的看法及其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4〕_{p. 272}。照会、公函发出以后,各方反应颇为热烈,不久森有礼便收到一大摞材料,主要包括美国各界13位著名人士的复

函,以及美国教育部官员发出的题为《论美国的教育》(*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文和耶鲁大学教授怀特尼(W. O. Whitney)撰写的《论在日本采用英语》(*On the Adop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Japan*)一文两个附件,其中 13 位人士为:

表 1 《*Education in Japan*》与《文学兴国策》中 13 位美国人士姓名表

《 <i>Education in Japan</i> 》中 英文原名	《文学兴国策》中 汉文译名	生卒年	身份、职务
T. D. Woolsey	华尔赛	1801 - 1889	原耶鲁大学校长
W. A. Stearns	施瑞恩	1805 - 1876	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校长
D. Cooper	彼得哥伯	1791 - 1883	实业家
O. Perinchief	潘林溪	1829 - 1877	牧师
J. H. Seelye	西列	1824 - 1895	阿姆赫斯特学院教授
J. McCosh	麦高希	1811 - 1894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J. Henry	恩利约瑟	1797 - 1878	原美国科学振兴协会会长
M. Hopkins	赫普经	1802 - 1887	威廉学院(Williams College)校长
D. Murray	满勒	1830 - 1908	卢塔格斯学院(Rutgers College)教授
B. G. Northrop	脑禄德	1871 - 1898	康涅狄克州教育委员会主席
C. W. Eliot	欧理德	1834 - 1926	哈佛大学校长
G. S. Boutwell	鲍德威	1818 - 1905	美国政府财政部部长
J. A. Garfield	加非德	1831 - 1881	美国众议院议员,1880 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上述 13 位人士中,有 4 位大学校长,2 位教授,固然可谓教育家;其余虽为政府官员或各界人士,但也都与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华尔赛从 1846 年至 1871 年连续 25 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权威,现耶鲁大学校园内的华尔赛厅(Woolsey Hall)就是为纪念他而建造的[6] pp. 165 - 166。欧理德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1809 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对大学规模的扩大、教学内容的改革等贡献良多[7] pp. 240 - 241。此外,彼得哥伯是一位致力于推动美国科学及实业教育发展的大实业家,1857 年,他在纽约创办了著名的彼得哥伯协会(Cooper Union)对广大职工、市民开展以教授自然科学、工艺美术为中心的实业教育[8] p. 19。还有一些人则与森有礼私交密切,如恩利约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有多项发明问世,他曾推荐自己的友人莱曼(C. Lanman)做森有礼的秘书,协助森有礼编辑《美国的生活与资源》一书[9] pp. 97 - 98。森有礼将这 13 位人士的复函及上述两个附件汇编成册,又用英文撰写了长篇序言,于 1873 年以《*Education in Japan*》为书名在华盛顿正式出版。

就在森有礼编辑《*Education in Japan*》期间,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日本使节团来到美国访问考察。随同岩仓一行出访的有文部省官员田中不二麻吕、教育家新岛襄等,他们旨在考察美国的教育,以便为制定日本近代学制提供借鉴。使节团在美期间,森有礼负责接待工作,并将《*Education in Japan*》的原稿复制后委托使节团捎回日本,对日本 1872 年学制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 13 位人士之一的满勒早在明治维新前后就与在其执教的卢塔格斯学院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吉田清成、松村淳藏等人频繁接触,并通过他们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日本的文化教育,因此,他在复函中所表达的看法和建议引起了岩仓具视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重视,遂于 1873 年至 1878 年间被日本文部省聘为顾问,直接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有关工作,特别对日本导入美国师范教育体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Education in Japan*》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森有礼回日本后所开展的启蒙宣传活动中。通过在日本组织启蒙社团来开展启蒙宣传活动,是森有礼初抵美国时就已萌生的想法;后来,

当他读了部分复函中谈到美国启蒙社团及学术团体的情况后,更是坚定了这一想法。1873年7月,森有礼任期满回国后不久便拜访了著名学者、教育家西村茂树,商谈创立启蒙社团一事。他说:“在美国,学者都按照各自所学的专业,组织起学社互相切磋学问,并进行公开演讲,以益世人。我国的学者却十分孤立,互不往来,以致很少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我希望,我国的学者也能像美国学者一样结成学社,集合在一起开展研究。况且,我国近年来国民道德正在无止境地衰退,只有老学士们才能担当起拯救的重任。因此,现在应该组成一个学社,一方面谋取学问的提高和长进,另一方面旨在树立道德的模范。”^[11] (p.454)在森有礼的倡导下,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树等人组织起“明六社”,创办《明六杂志》,鼓吹“文明开化”,倡导教育改革,为明治初期日本创立近代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林乐知与《文学兴国策》的主要内容

在本文所探讨的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森有礼作为官方外交使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林乐知则成为沟通三国关系的民间使者。林乐知于1836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青少年时代参加了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1858年毕业于爱莫丽学院(Emory College),两年后受该会派遣从纽约渡海来到上海。1864年,经冯桂芬等人介绍,林乐知被聘为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1868年,他创办《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71年,他又被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此后10年,他身兼教习、译员、编辑、传教士四职。1881年,林乐知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的工作,自办中西书院。1887年广学会成立后,他又担任该会机关刊物《万国公报》的主编。

林乐知来到中国后便开始关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所撰《中西关系略论》发表在1875年9月至1876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他也十分关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特别重视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日本近代化改革。1878年,林乐知回国途经日本,在一个半月里漫游日本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甲午战争前后,他从英文报刊上大量摘译了欧美人士有关这场战争的评论,又撰写了《中日朝兵祸推本穷源论》、《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日本新岛自历明证记略序》等文,编汇为12卷本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与此同时,又将《Education in Japan》译为《文学兴国策》。他从分析甲午战争的结果入手,将日本的胜利视为其近代化成功的象征,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近代化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积极导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他写道:“洎乎明治维新,迁都江户,改名东京,诸藩纳土,西法盛行……与各国立约通商,政令为之一新。西人之足迹,几遍乎国中;东人之游踪,广行于海外……取泰西各国兵农工艺,一切有益之良法,次第行之,以增长其智慧,更新其教化,奠安其国家。”^[12] (p.2)他进而强调:“其尤有益于国家者,厥惟振兴文学(指教育——笔者注)一端。明治初年,即降谕旨云,今观国人之文学,衰微极矣,若与西国之文学,絜短较长,可耻孰甚焉。嗣后,当勤求新法,以兴学为要务。”^[12] (p.2)在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改革时,林乐知率先向中国人报道了森有礼出使美国、编辑《Education in Japan》这段史实:“查日本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派员出使外洋,其派赴美国之署理公使,实为森君有礼。森君之使美也,除办理交涉事宜外,特奉朝命,就近查访美国文学成规,以为日本兴学之先导,于是照会美京文学部大臣,暨各部大臣、议院各绅,并缮公启一通,分致各大书院监院,及一切著名文学之人,广求设塾之良规、教习之成法。森君幼时,曾在英国读书,颇著名誉,且留心当世之务,精益求精,以故美国之官绅,皆敬之重之,且乐于答复之,一时名言说论,纷至沓来,裒然成集,森君乃编次各函,勒为一编……邮寄本国,上之于朝。朝廷采而用之,延聘泰西之名师,大兴日本之新学,至今学校盛行,分门别类,节目繁多……几与美国之学校相若。”^[12] (pp.2-3)

以林乐知之见,日本导入欧美近代教育的成功经验应该为中国所借鉴和仿效,中国应该以日本

为榜样,参照欧美近代教育的模式来改革传统教育、创立近代教育。他说:“兹观是书,以美国之成法,行之于日本,业已明著大效矣。岂不可以日本之成效,转而望诸中国之人乎。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翻然变计,而知取法矣。”〔12〕p.3)在此,林乐知知道了他翻译《Education in Japan》的动机和宗旨。

如前所述《Education in Japan》含有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森有礼的英文长篇序言,主要论述了他本人对日本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三部分为两个附件,其中之一为耶鲁大学教授怀特尼所写的《论在日本采用英语》一文。在林乐知看来,这两份材料对中国教育改革意义不大,故未译出,因而《文学兴国策》包含了美国13位人士的复函和美国教育部官员《论美国的教育》一文。在这里,林乐知按古汉语的习惯,将“文学”作为“武功”的对应之词,取其“学问”、“教育”之含义而用之。

《文学兴国策》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在中国创立近代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问题,为此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的情况。潘林溪在复函中认为,中国在创立近代教育之初,应仿美国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统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文学部”,设大臣以专理之,并派各部大臣以协理之,然后学制由此而立,学官由此而选,各等学塾亦由此而建〔13〕p.19)。他又根据美国的经验论述了学制系统中的各级学校:“始入义学(指义务教育阶段——笔者注)而读书焉,此为初学入门之阶,故谓之蒙馆;启蒙之后,识字明理,功课日进,乃由考试而入文法学堂,各照学生之功课才能,分班肄习,而教师之功力,亦因免而渐省矣;乃更由考试而入高等学堂,仍照原班,教之精深之学问,进之以格物之功夫,过此以往,又可使之入大书院而肄业焉,大书院之制,教习各国之方言,讲求性理道德之学问,并研究一切上等之才学,且备各种格物(指物理——笔者注)化学器具图说,别贮一室,以助学生之肄业,等而上之,又当有所谓普学院,所以课专门名家之学也,若格物、制造、律例、医药、矿务等学,皆于此中肄习之焉,又有至大藏书之楼,名人讲解之法,及一切顺便易为之事,维时学者见识已明,精神已足,可各照其擅擅之才能,分门别类,使自择其质性所近之学,而专精其心力,以期大效。且自启蒙之义学以上,至于大普学院为止,皆当于读书之外,兼习音乐,如琴瑟等,以为悦性怡情之助焉。总而言之,一国学校之规模,尽于此矣。”〔13〕p.18)麦高希则把美国近代学制明确分为三段,即相当于小学阶段的初学之塾、相当于中学阶段的中等学堂和相当于大学阶段的大书院〔13〕p.24)。林乐知将美国教育部官员的《论美国的教育》一文译为《美国兴学成法》,其中将美国三级学制细分为六个层次,即启蒙公学——寄养学堂——高等学堂——中书院——大书院——普学院〔14〕p.26)。上述各处之译名虽不统一,但从中仍可窥知美国近代三级学制之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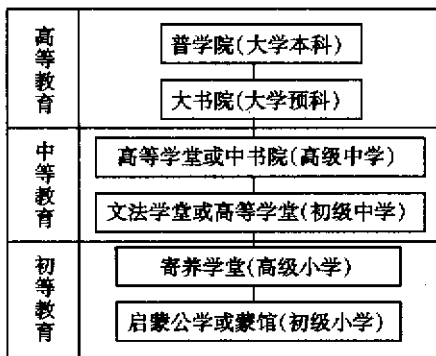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近代三级学制图

在《文学兴国策》中,除了上述有关中、小学普通教育及大学专门教育的论述外,还介绍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及师范教育的情况。满勒指出,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各类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美国设立了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造就各类专业人才;“使他年学业有成,或精于机器,或熟于驾驶,或工

于造船,或巧于建屋,或明于五金,或善于制造,无一非国中 useful 之人”〔14〕〔p.7〕。由此,他认为:“国家振兴文学,既设大小各等学校,使国人无不读书,又当特立学堂(指职业技术学校——笔者注),使以上各项专门之学,能得竟其全功,而期于必成”〔14〕〔p.7〕。欧理德则在复函中强调了创立近代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写道:“至于教学之法,贵有良师,学堂既遍设于境中,则教习必广延而无阙。延师之道,亦有二端:先在西国访请良师,以为之倡,继在本国设立师范学校,以造就师儒,将见不数年间,即可于本地得良师矣。”〔14〕〔p.15〕《美国兴学成法》一文还介绍了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这样《文学兴国策》不仅展现了美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三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导入了普通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相辅相成的近代教育体制,为晚清中国创立近代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不过《文学兴国策》最显特色之处,并非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而在于阐述了创立美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基本理念及指导思想,这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传播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的教育理念。众多人士认为,近代教育应贯彻普遍立学、平等受教的基本精神,并将这种平等主义的理念视为近代教育的首要原则,用他们的话来说:“文学之事,不独振兴于大众,必当汇万类之人,合男女之众,包世人之心,使遍国中无不振兴之也”〔13〕〔p.15〕。国家“更当去其分教分类之陋习,而平等以教之”〔13〕〔p.17〕。贯彻平等主义教育理念的主要方法和措施即为推行实施义务教育,国家通过公立学校来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不少复函根据美国的经验阐述了义务教育国家公办的性质,表明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例如,满勒在复函中写道:“初学(指小学——笔者注),此等学堂,即敝国所奉为公学,由国家供给者也。凡府州县城以至乡镇,无不设焉;凡七岁至十四五岁之幼孩,无不入焉;凡一切启蒙之学,无不教焉。有如学习读书写字,以通本国之语言文字;学习数码算法,以备将来讲求格致通商之用;学习史鉴地理,以知本外国之情形。以上各学,人无论男女,境无论贫富,位无论贵贱,皆当于公学中教训之焉。”〔14〕〔p.11〕。脑德禄将近代义务教育的无偿性、平等性、世俗性三大原则概括为:“一、无论何人,来学者,概不取脩金;二、有教无类,无论何人之孩,皆准入学读书;三、来学者,无如何教(指宗教——笔者注)之人,皆不另设功课以教之。”〔14〕〔p.14〕。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士在阐述平等主义教育理念时还着重表达了男女平等受教的主张。满勒把振兴女子教育列为创立近代教育的五大要点之一,他写道:“凡国之女学,必当使与男学并重也。……夫女子之必当有学者,可使知修身齐家之道,得与男子同心偕老耳。家人之安乐,出于妇女者尤多,有识者,所以必励女子之操修也。况乎人生幼时之学,每易志之于心,管教幼孩之权,操于妇人之手,欲后世之多贤子孙,必先教训今日之女子,使尽成为他年之贤母”〔14〕〔p.10〕。他还批评了中国传统女子教育观,认为:“世有创为女子无才为德之说者,岂非不思之甚哉”〔14〕〔p.10〕。《美国兴学成法》一文进一步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界已超越女子教育旨在培养贤妻良母的观点,各个层次上的女子教育均大为发展:“国中之女书院大兴,且较男书院为尤多,而精美亦过之,且亦有分类专精之女书院,凡男子所读之书,妇女莫不读之也”〔14〕〔p.29〕。

第二,阐扬了欧美近代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被马克思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5〕〔p.20〕的美国《独立宣言》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提倡“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说”,为欧美近代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蔑视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主张在共和制下赋予人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利,为此,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把人民塑造成民主共和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教育本身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管理方式。这种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后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贺拉斯·曼等美国思想家、教育家发扬光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文学兴国策》中。华尔赛在复函中写道:“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致富耳。……然以愚见论之,国人有如此之学问者,尤必济之以自主之心,自择兴利之

途……通国皆有学之人,亦必通国皆自主之民,而后可也。〔13〕〔p.2〕强调教育不仅要培养有谋生致富本领的人,更重要的是要造就有民主意识的近代国民。恩利约瑟进一步指出,欧美近代民主主义教育理念旨在使人民“咸知自主自治,以备他日登明选公,可为国家之大用”。因此,他认为这种理念的本质在于“望民有治国之权,愿民有自由之意”〔13〕〔p.27〕。鲍德威把上述民主主义教育视为美国立国之本,他说:“凡一國中读书之人,即为一國中深知律法、熟諳政事之人。盖民之不学者,往往无知,一任国家之管理,而不得握治国之权矣。若夫有学之民,类能明理,自主自治,不受国家之虐政,此为美国振兴之来源”〔14〕〔p.17〕。大多数人士认为,只有采用民主的管理方式,才能确保近代教育的民主主义性质。《美国兴学成法》中写道:“美国立国之根本,最重者,即在人民之自主,朝廷(指政府——笔者注)亦体斯意以出治,必以使民自主为要图,诚知民生必先有自主之权,然后可以自显其才能,自求其进益,且自勤其文学也。不但此也,朝廷行政之全模,亦即以此为本。”〔14〕〔p.22〕据其记载,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经费以税收的形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学校“管学之董事,皆由各学生之父母,公举而立之,更由董事延名师,定课程,购办应用之书籍器具,建造合宜之学塾,明定开学之日期,勤求良法,以造就学生……城学监督,虽有管理各乡公学之权,实亦为众民所公举,此不可误以为官设者也”〔14〕〔p.25〕。

第三,导入了欧美近代科学主义的教育理念。倡导欧美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是贯穿《文学兴国策》中的一个主题。恩利约瑟指出:“泰西之新学,实根于格物之功夫,非徒知外貌者,可得而并论也。格致之功夫,日新而不已,新法日增,权力日大,西国之得致富强,皆由于此。此可知格致之学,实乃裕人财、增人智、助人力之大源。……故欲振兴文学,当深思格物之妙理,有何关系于人生进益之端,将愈显然于贵国之延师设塾,必当包括格致之新法,及一切有关养生立命之功夫。”〔13〕〔p.26〕主张近代学校教育当以教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潘林溪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有助于启发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使之臻于文明开化的境界。他说:“当世文明之国,由其国中多文明之民,故其作为多文明之政教,可知国之大宝,实在于致知之学、益智之方。”这主要是因为“惟精于格物之学者,为能顺物之性而用之,以补生人之缺乏。”藉此使人民“可自觉其才能之日新矣,且可自觉其知觉之才、想像之才、辨别之才,亦与之日新矣。故其兴也,由粗鄙而入文雅,由愚鲁而进聪明,更由缺乏孤陋之本质,变为充实光辉之完人”〔13〕〔pp.10-11〕。彼得哥伯在复函中侧重介绍了彼得哥伯协会向职工、市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情况,强调不仅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而且在社会教育系统中也应积极推广科学及实业教育。

四、《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及影响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西学东渐”的潮流,欧美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引入了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沟通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 Faber)所著《德国学校论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著《西学考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所著《七国新学备要》即为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的几部主要著作,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传统教育、创建新式学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但是,与这一时期开展的洋务教育相吻合,也由于其作者在思想上的局限性,这几部著作主要介绍了欧美近代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及管理方式等,而未涉及欧美近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及指导思想。由于《文学兴国策》是由13封信函构成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信函的作者乃美国各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拙文《西学考略与中国近代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1期)、《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同上,2000年第2期)。

界有识之士,其中有不少是教育家或教育管理专家,因而《文学兴国策》不仅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而且以论述欧美近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及思想原则为主,这些理念和原则被导入中国,恰好弥补了以往导入欧美近代教育之不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甲午战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变化,这不仅是由于堂堂大清帝国败在“蕞尔三岛”的日本手下这一事实,而且是因为部分先进人士鉴于这一事实认为,中国只有向日本学习,全方位地导入欧美近代文化和教育,才能取得近代化的成功。康有为在总结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失败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强敌(指日本——笔者注)为师”(16 [p.1])的改革方针,主张清末改革以日本为模式。张之洞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模式说”的热心倡导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兴国策》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既向国人阐释了日本成功的“秘诀”,又为“日本模式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言”中写道:“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勃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为圭臬,当晓然于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可兴矣。”(12 [p.3])这段话可谓对“日本模式说”的高度概括。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在为《文学兴国策》所写的“序言”中,也揭示了该书对中国以日本为楷模,借鉴欧美教育经验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此书,为日本前任驻美公使森君殷殷访问而得之者。美国广兴文学,百余年间,日新月异。日本得其成法,行之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况我中国自有学校,自有宏谟,更采刍蕘,以匡不逮,人才辈出,国势勃兴,直指顾间耳”(17 [pp.1-2])。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1874年和1882年,他曾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繁荣景象,从此“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18 [p.11])。《万国公报》成为康有为接触、研究西学的重要读物,而林乐知为《文学兴国策》所写的“序言”即于1896年5月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由此可以推知,康有为对《文学兴国策》并不陌生。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鼓吹变法,欧美近代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的教育理念渗透在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之中。继康有为之后,梁启超通读了《文学兴国策》一书。1896年,他编辑了《西学书目表》,将《文学兴国策》列入其中,并说明:“近印之《文学兴国策》为日本兴学取法之书”(19 [p.455])。他还强调:“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20 [p.19])次年,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一文,围绕着学校、师范、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等专题,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和主张。由此可见,《文学兴国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应该说《文学兴国策》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学校的创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95年,盛宣怀在他所制订的《天津中西学堂章程》中写道:“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C. D. Tenney——笔者注)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深必期切近而易成”(21 [p.491])。学界一般认为,盛宣怀先后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主要以美国和法国教育为模式。1898年,盛宣怀上奏清廷开办南洋公学,他所制订的《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21 [p.513])。“公学课程,参酌东西之法。”(21 [p.514])与此同时,清廷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同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 Reid)向光绪皇帝上奏《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狄考文(C. W. Mateer)向总理衙门上奏《拟请创设总学堂议》,他们都主张中国应仿效日本,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为模式创办近代大学。因此,罗敦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指出:“欧美来传教者,若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恒有所设学,在中国言学务,李林等其先导矣。故求欧美学者恒于教士,当时士大夫所见,仅乃及此也”(22 [p.157])。无论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还是清廷创设京师大学堂,均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为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兴国策》便为此提供了一份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材料。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3]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1卷[C].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
- [4]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3卷[C].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
- [5] 犬冢孝明.森有礼[M].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
- [6] B.S.Cayne.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2[Z]. New York: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64.
- [7] B.S.Cayne.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1[Z]. New York: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64.
- [8]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3卷解说[Z].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
- [9]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1卷解说[Z].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
- [10] 尾形裕康.学制实施经纬の研究[M].东京:校仓书房,1963.
- [11]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2卷[C].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
- [12]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林序[M].上海:广学会,1896.
- [13]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卷上[M].上海:广学会,1896.
- [14]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卷下[M].上海:广学会,1896.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6]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A].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0卷[C].台北:宏业书局,1976.
- [17]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龚序[M].上海:广学会,1896.
- [18]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9]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A].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1册[C].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 [20] 梁启超.变法通议[A].林志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C].上海:中华书局,1996.
- [21] 朱有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22]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C].上海:中华书局,1928.

[责任编辑 徐 枫]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America in Modern History

XIAO L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rinori Mori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ponents of Western ideas of education in Japan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From 1870 to 1873, he served as the Japanese deputy minister in Washington, where he surveyed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published *Education in Japan* (1873). In 1896, this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oung J. Allen, a Methodist missionary of America, who sailed from New York to Shanghai to be missionary ambassador to China in 1860 and contributed his life to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is translation on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 in Japan"; Arinori Mori; Young J. Alle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